

社会科学新思维书系

SHEHUIKEXUE
XINSIWEI
SHUXI

人类自身生产 与物质资料生产研究

万高潮 王健康 著

湖南出版社

人类自身生产 与物质资料生产研究

责任编辑: 彭富强
装帧设计: 尹文君

人类自身生产与物质资料生产研究

万高潮 王健康 著

*

湖南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1997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5

字数: 260000 印数: 1-1000

ISBN7-5438-1471-4

B·34 定价: 18.60元

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

——马克思

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想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完了，但是他们梦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为荒芜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失去了积聚和贮存水分的中心。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在山南坡砍光了在北坡被十分细心地保护的松林，他们没有预料到，这样一来，他们把他们区域里的高山牧畜业的基础给摧毁了；他们更没有预料到，他们这样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而在雨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在欧洲传播栽种马铃薯的人，并不知道他们 also 把瘰癧症和多粉的块根一起传播过来了。因此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

——恩格斯

序

摆在读者面前的《人类自身生产与物质资料生产研究》这本书，在其还是修改中的书稿时，我就有幸拜读了。我是以非常兴奋和欣赏的心情阅读的。付梓前作者要我写几句话，我当然乐于从命。我期待着读者朋友们同我一道来分享这份丰厚的学术成果。

众所周知，以往人们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多停留在“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决定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这个层面上，既不更深入地对“生产”本身，也不对“生产方式”的决定性构成因素——“生产力”作进一步的分析。应该承认，对唯物史观的这种传统理解，充其量只能使它成为“解释世界”的工具，而不能成为“改造世界”的武器。道理很简单：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上，还远未揭示出“决定”的机制，因而根本没有可操作性。要想克服唯物史观创立时就已经超越了的这个旧哲学所固有的缺点，使唯物史观不仅能够“解释世界”，而且能够“改造世界”，理论研究的深度就必须进入像“生产”和“生产力”这样更基本的层面。只有从这里开始，再一步一步向上提升：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等等，才能把整个社会的结构及其发展变化说清楚，才能为所谓“可操作性”提供前提。例如，对于现阶段我国人民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当然是生产和生产力迅速发展起来，因为无论是社会制度本身的发展，还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决定于此。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在理论上对生产和生产力的构成要素及其运行机制有一个清晰的了解。只

有这样，我们才能决定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怎样做才可以使生产和生产力得到发展，否则便可能适得其反，等等。依此追究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理论教训，就在于只讲所谓“先进”生产关系和“革命”精神可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没有问一问当时我国生产和生产力的具体状况，没有问一问其时我国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之间、人口和资源之间的关系究竟有没有条件去实现那样的“大跃进”。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没有也不知道作可行性研究。而不从唯物史观的高度对发展生产和生产力这样的根本性大问题作可行性研究，那么所谓唯物史观的指导，所谓“行动指南”，就只能是一些意识形态口号，不但于事无补，反而会惹出大乱子来。

我们长期以来在唯物史观研究中还存在一个方法上的大缺点，就是热衷于抽象地描述那些基本概念之间的所谓“辩证法”，例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概念之间的所谓“辩证关系”，而不愿意或不善于去研究像“生产”和“生产力”这样一些更加基本的概念，因而所谓“联系实际”，就不过是从大跨度的时空中截取一些历史故事，拿来作为理论的注脚，换句话说，我们对唯物史观只做抽象研究，不做实证研究。其结果，不管讲什么问题，只要一提到“理论的高度”，颠来倒去，总是那几个概念，没有具体材料，也不作实证分析。理论本来应该具有很大的说服力，可是我们的理论往往给人一种雾里看花的感觉：朦朦胧胧，似是而非。究其原因，就是马克思曾经批评过的，不是研究事实，而是咀嚼概念。实际上，尽管唯物史观就其理论形态而言确实是比较抽象的，但是它的内容却非常贴近生活实践。如果我们不具体细致地研究生产和生产力，而只满足于笼统地重复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命题，就只能说奉行

的不过是半截子的唯物史观。这种半截子唯物史观的用处，除了可以做意识形态的标签而外，就是可以为一切想辩护的东西辩护，此外再没有任何实际意义。我们是以唯物史观为哲学指导的，但是，恰恰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人口和资源，生产、生活和人类生存环境等重大问题上一再地把自己置于被动地位，这不能不说与我们对唯物史观的理解过于表面化，不愿意或不善于深入到它的理论基点中去有很大关系。改革开放以来，唯物史观逐渐显示出它的巨大威力，特别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和实施，表明在我们国家，唯物史观已经不再是过去说说而已，而是真正在发挥指导作用了。相形之下，我们的哲学界对唯物史观的研究，却还是没有脱开旧有的框架，因而显得落后了。

为了改变唯物史观研究的落后面貌，我认为，需要在两个方面有所改进。第一要扩大研究域。不能见物不见人，也不能孤立地就社会研究社会，而要把人和物、自然和社会联系起来研究。既不能像过去那样谈人色变，也不能把自然仅仅当作社会的消极客体。人是社会活动的主体，自然是社会永恒的具有反馈能力的物质基础。以研究社会发展规律为己任的唯物史观，怎么能否定和排斥人，怎么能忽视和藐视自然呢？马克思、恩格斯一开始创立唯物史观时就说得很清楚：“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那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只有把人和自然都纳入唯物史观的视野之内，我们才能对生产和生产力等唯物史观的真正的理论基点进行深入的研究，从而使唯物史观真正具有可操作性，发挥出应有的指导作用。

第二要改进研究方法。即在进行抽象的理论研究、进行逻辑推演的同时,要密切联系实际,要吸收相关的实证科学的科学材料和研究成果,进行具体的实证的研究。要把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结合起来。不要怕实证主义的帽子,这与实证主义没有关系。相反,需要改变的倒是长时期以来人们一直对之缺乏警惕的理性主义倾向,以为只要对现成的概念进行“辩证分析”就能解决实际问题。把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结合起来,也就是理论联系实际。没有认真的具体的实证研究,理论研究永远只能悬浮在半空中,落不到实处。我以为,如果没有以上这样两个方面的改进,对唯物史观的研究不管有多大的紧迫感,都不会取得太多的进步。

我之所以看好《人类自身生产与物质资料生产研究》这本书,首先当然是因为它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课题,了却了一桩已经有一个世纪历史的公案,为恩格斯、为“两种生产”学说正了名,复了位,并应用这个学说对社会的发展、生态的变化作了具体的说明,特别是为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了理论论证,在学术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同时,也因为它体现了作者在上述两个方面所作的有益的尝试。事实上,这二者是互相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没有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上的改进,不可能在学术上取得这样的成功。《人类自身生产与物质资料生产研究》的学术价值,概括地说,就是通过对物质资料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对“生产”和“生产力”作了深入的分析与解构,从而一方面拓宽和加深了唯物史观的研究域,把马克思、恩格斯的一向为人忽视甚至责难的“两种生产”学说堂堂正正地复归到唯物史观的殿堂中来,从而使唯物史观如实地表现为一个严整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拓宽和加深了唯物史观的应用域,即不但用以说明社会的发展,而且用以说明自然即人类生存环境的变化,从而

使唯物史观真正表现为我们行动的指南、表现为我们“改造世界”的武器。

细说起来，这本书至少在下列五个方面体现了作者可贵的学术努力：

第一，通过发掘“两种生产”这个概念与社会存在、与现实生产力的内在联系，拓宽和加深了唯物史观的研究域。作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两种生产”的学说是以唯物史观的创立为理论背景而形成的；他们是在诠释社会存在这个概念的过程中，提出和发展两种生产学说的；社会存在的概念与两种生产的概念在外延上几乎是互相等值、互相涵盖的。所谓社会存在，从外延上说，指的就是“生命的生产”即既包括人类自身的生产与再生产，也包括物质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还包括这两种生产各自的“自然关系”与“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这也就是说，研究社会存在，研究现实的社会生产，研究制约历史发展、决定社会状况的人类社会的“世俗基础”，都不能只研究物质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以及这种生产的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还必须同时研究人类自身生产的生产与再生产，以及这种生产的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而且还必须把这两种生产作为同一个过程来研究。应该说，作者的这个观点是符合唯物史观创始人的本意的。我们过去只从物质资料的生产方面去研究是片面的，不符合唯物史观创始人的本意的。

第二，通过追溯两种生产学说形成发展的过程，证明了这个学说决不像人们所指责的那样，是什么“二元论”，是恩格斯对马克思的背离，而是他们二人共同创立的科学学说。作者的考证和分析做得相当仔细。他们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哲学著作开始，中经

《资本论》等经济学著作，最后到《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人类学著作，逐一追溯了其中有关“两种生产”学说形成发展的全过程，证明“两种生产”学说与唯物史观相始终，是唯物史观的最基础的组成部分。作者指出，批评“两种生产”学说是“二元论”的人，不仅滥用了“二元论”这个既定的哲学概念，更主要的是曲解了“生产力”这个概念。他们仅仅从物质资料生产方面去界定生产力。实际上，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生产力是一个比物质资料生产更加深刻的概念，只有把物质资料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综合起来，才能形成现实的生产力。因此，说人类自身生产也是历史中的决定因素，这并不是说在生产力之外还存在这样一个决定因素，而是说它是内在于生产力之中的一个因素。可见，说两种生产制约着历史的发展，与说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因素，完全是一个意思，只是层次不同而已。两种生产学说的意义在于，它使生产力这个概念得以展开，成为一个不仅可以从质上而且可以从量上加以把握的概念。正是两种生产的优化组合，使生产力得以发展。只有通过两种生产的研究，唯物史观才能在发展生产和生产力这个根本问题上具有可操作性，从而真正发挥指导作用。这个意思，在《人类自身生产与物质资料生产研究》这部著作中表达得极其充分。这可以说是全书最精彩的内容了。

第三，通过发掘马克思、恩格斯既有的思想，并吸收和消化人口经济学、人口社会学等具体学科的科学材料和研究成果，初步阐明了两种生产决定人类社会发展的—般机制。这就是，物质资料生产与人类自身生产的关系协调与否，直接影响着劳动生产率的高低，从而决定了旧的社会形态向新的社会形态质变的可能性；同时也直接影响着人均生活水平的高低，从而决定了同一社

会形态在其量变阶段的状态是稳定发展，还是趋向动荡。为了证明这一点，作者遍查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作了许多发微的工作，而且引用了大量历史的和科学的材料。在这里非常鲜明地体现了作者把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结合起来的研究方法。正是这种研究方法，使得作者的结论不只是逻辑推演的结果，而且有事实为证。这样的结论比单纯的逻辑推论自然有更大的说服力。我们过去讲一种旧的社会形态向另一种新的社会形态过渡，只是说因为生产力的发展需要打破现成的生产关系的束缚。这里所谓生产力的发展，基本上只能作一种质的分析和描述，无法从量上加把握。现在让两种生产站出来讲话，通过劳动生产率这个量化概念，作出的判断就具体得多了。当然，新旧社会形态的交替还取决于其他许多因素，但是劳动生产率的高低、上升还是下降，始终是最基本的决定因素。劳动生产率上不去，即使把旧社会推翻了，新社会还是立不起来，即使立起来了也还巩固不了，发展不起来，最终还得倒退回去。

第四，通过发掘马克思、恩格斯既有的思想，并吸收和消化资源经济学、生态经济学等具体学科的科学材料和研究成果，初步阐明了两种生产影响人类生存环境的一般机制。这就是，物质资料生产与人类自身生产之间的关系协调与否，直接影响着自然资源的供求状况与生态环境变化的方向，从而决定人类生存环境是趋向优化还是趋向恶化。作者的这个观点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唯物史观历来只用于说明社会本身的发展变化，至于人类生存环境的问题，过去一直无人问津，近几十年来才成为生态经济学等具体学科的研究对象。现在作者把这些具体学科的科学材料和研究成果，与两种生产学说联系起来研究，这就把人类生存环境的问题提到唯物史观的高度上来加以审视了。其结果，一方面为生态

经济学等具体学科增添了更深刻的理论内容,另一方面为唯物史观增添了更多的科学内容,从而大大地拓宽了它的应用范围。这种拓宽,从社会发展的研究来看,又是一种深入。如前所说,社会的发展是离不开自然界这个人类生存的环境的,后者的优化还是恶化,对前者有直接的影响。历史上由于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使得一个民族或一种文明整个归于灭亡,这样的例子并不罕见。为了把人类自身的活动与生态环境联系起来考察,引起更多的人从社会发展的高度来关心生态问题,我认为也许应该成立某种社会学学术团体,例如“唯物史观生态环境协会”来加以推动,这肯定不会没有意义。

第五,通过将两种生产学说的研究与当代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为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推行限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的人口政策,更新非持续的消费方式与生产方式,提供了唯物史观的理论论证。当代中国两种生产严重失调,这已经是不争之事实。需要研究的是这个事实在各方面的表现,以及造成这个事实的原因。弄清了这些问题,才有可能采取有效的对策,把两种生产协调起来。为此,作者首先从人口爆炸的事实出发。作者赞同邓小平的观点:“中国一切麻烦的根源就在于人口太多!”作者指出,由于人口太多,劳动生产率长期停滞不前,甚至下降,人均生活水平也长期停滞不前,甚至下降。由于人口太多,我国从绝对量来看本来不算太少的自然资源,一平均到每一个人头上就少得可怜了,所谓“地大物博”立刻变成了“地小物少”。由于人口太多,生态环境的污染和破坏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作者在这里引用了许多使人震惊的资料。接着,作者从社会经济根源和社会政策根源上探讨了造成两种生产失调的原因。在这里,作者特别提到了1957年马寅初先生提出的“新人口论”及其遭遇,令人嗟叹

不已。笔者记得，当时这个“新人口论”遇到了“人手论”的强有力的批判，说马寅初先生只把人看作消费者，其实人首先是生产者，云云。批判者忘记了“生产也是消费”这个基本道理。没有足够的生产资料供生产者作生产性消费，生产将何以进行？看得出来，当时我们国家从上到下对“两种生产”几乎没有概念！回顾这段历史，使我们这些过来人感慨万千。最后，作者对我国政府决定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极表赞同，并就人口的数量和质量、消费方式和生产方式等方面如何贯彻这个战略，作了详细的分析。通过两种生产的研究，使唯物史观具有可操作性，在这一部分，表现得最为鲜明，给人的启发也最具体、最实在。

最后，我还想说一下作者在做“考据之学”时所采用的方法，这就是逐字逐句、逐章逐节解读本文的分析哲学的方法。应该承认，本书作者采用这种方法对“两种生产”的提法、意义以及各方面的理论内容进行考证，的确做得相当成功。但也不是没有问题，这就是过分追求概念、命题的一致性，以致于在某些地方做得有些勉强。事实上，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前后几十年、洋洋数百万言的著作中，并不是每一个概念和命题都是一义的，被赋予多种含义的事也是常有的。重要的是要抓住其中占优势的意义，并对不同的、有差别意义作出合乎语境的解释。过分追求一义性，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记得当代美国分析学派的代表人物威廉姆·肖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他并不指望通过解读马克思恩格斯的原文，一定能对所有被考察的概念给出前后一贯的定义。由于本书作者过于执着，希冀一举廓清围绕着“两种生产”进行的争论，无意中又留下了一些疑点。例如，关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部著作，作者写道：“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不仅分别地对两种生产各自的规定性作了初步阐述，而且

还通过对‘异化劳动’概念的展开，初步阐明了两种生产本质上是同一个社会生产过程。”实际上，这个时候马克思离两种生产是所谓“同一个社会生产过程”的思想还有一段距离。作者举出的两段文字也都不是说的两种生产，而是说的资本主义条件下，异化劳动不仅生产商品，而且生产一边是工人、一边是资本家的剥削关系。当然，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著作。只要在大的方面，在主要的方向上做得成功，就是一本好书。《人类自身生产与物质资料生产研究》尽管有上面说到的问题，但在主要的方向上的确做得很出色，我真诚地愿意将这样一本好书推荐给学术界和广大的读者朋友们。

冯兰瑞

1996年6月6日

引言

1884年，恩格斯写作并出版了自己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就路易斯·亨·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而作》。在这本书的序言中，他一开始就郑重申明：“以下各章，在某种程度上是实现遗愿。不是别人，正是卡尔·马克思曾打算联系他的——在某种限度内我可以说是我们两个人的——唯物主义的历史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来阐述摩尔根的研究成果，并且只是这样来阐明这些成果的全部意义。”至于什么是他本人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历史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恩格斯紧接着这样说：“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①

35年以后，列宁在《论国家》中曾这样向读者推荐恩格斯的这本书：“这是现代社会主义的基本著作之一，其中每一句话都是可以相信的，每一句话都不是凭空说的，而是根据大量的史料和政治材料写成的。”列宁还特别强调：“我所以提到这部著作，是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页。

因为它在这方面提供了正确观察问题的方法。”^①

然而，尽管列宁如此推崇这部著作尤其是它的“方法”，但几乎自《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出版之日起，恩格斯的这本书特别是他所使用的“方法”，就一直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批评。批评者异口同声地认为，恩格斯的两种生产学说是在物质资料生产之外另加上人类自身生产作为“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因而违背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一元论的原则，犯了“二元论”的错误。如俄国社会学家米海洛夫斯基在1894年，日本经济学家河上肇在本世纪初年，斯大林及前苏联学术界自本世纪30年代以来，均持这样一种见解。至于我国学术界，自本世纪50年代以来也一直在对此一问题进行探讨。不过我国学者几乎无人批评恩格斯，反倒有不少学者认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提出关于两种生产的学说，是对马克思及恩格斯本人以往将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仅仅局限于物质资料生产的“补充与修正”。

显而易见，不论是褒是贬，以上两种意见都有一个共同点，即都认为只是到《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才形成自己关于两种生产的思想，不过褒者对此予以褒、贬者对之予以贬罢了。那么情况果真如此吧？至少本书作者并不这么看。但考虑到两种生产学说的理论传承问题不仅是以往关于此一学说讨论的焦点所在，而且这个问题也的确涉及到此一学说在唯物史观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合法性”，所以我们仍准备使用本书三分之一的篇幅，来仔仔细细地追溯两种生产学说从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为代表的哲学著作时期，经以《资本论》为代表的经济学著作时期，到以《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和

^① 《列宁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2页。